

静默地哀悼秦怡老师

简平

从5月9日起,我的这个小区进入为期三天的“静默日”,一有时,得到秦怡老师仙逝的噩耗,心里真的沉沉地静默了。回想四年前的3月2日,我也好,秦怡老师也好,那时候却是无限欣喜地大叫的。

那天是元宵节,上海文艺界在文艺会堂举行新春茶话会,来自全市文艺界的艺术家代表欢聚一堂,共贺戊戌新年。戊戌是狗年,所以,茶话会从每一甲子本命年属狗的人中选了一位代表上台致辞,并接受各个门类的艺术家们精心准备的礼物。我是代表1950年代的“狗”,而那天最大的“狗”是96岁的秦怡老师。我临上台前,特

意先跑去秦怡老师那里——我们40年代到90年代的“狗”都坐在一张圆桌上,可秦怡老师因为坐着轮椅,而且还在主桌,所以没和我们一起,也不上台致辞。我跟她说了句“悄悄话”:“秦老师,一会我上去时,您想让我说些什么啊?”她笑了笑,对我说:“你就多喊几声‘汪汪’好啦!”于是,我心领神会,结果在台上大声地叫了八声“汪汪”,当然不是学狗叫,而是“旺旺”。我边叫边望向秦怡老师,她也正看向我,还对着我拍手。

其实,那天秦怡老师身体不太舒服,她原本可以不来参加活动的,但她觉得大家都盼着在狗年能看到属狗的她,她不想辜负大家的一片心意,所以她对文联和影协的同志说,我去参加吧,再说她住在华东医院,与文艺会堂仅隔一条马路。那天,她把自己打扮得满身喜气,粉红色的外套,长长的红色围巾,头上戴着的一顶绒线帽也是红黑相见,尽管她比之前瘦了好多,但还是显得很精神。

这就是秦怡老师,她这辈子的人生并不平坦,充满坎坷,但她总是心怀坦荡,从容面对。当时,她刚刚拍完陈凯歌导演的《妖猫传》,她在电影中饰演白头宫女,这个角色因最后之死而震撼人心,不过也有人说她不该去演这么一个人物。秦怡老师听到后淡然一笑,我心里想,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会明白戏里的决绝也是一种现实人生。这就可以理解她为什么会在90多岁高龄还去青海,忍着海拔4200多米的高原反应,坚韧不拔地完成了她电影生涯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影片——《青海湖畔》。这部电影是秦怡老师自己编剧、自己主演的,以青藏铁路建设为时代背景,讲述了以一位女气象工程师为代表的科学家们,在高原上克服重重困难开展科考工作的故事。这是一部电影,也是一种精神。秦怡老师告诉我说,她是听到一个真实故事后才萌发拍摄这部电影的想法的,她确实是全身心地投入,因为她想通过电影,传达

她自己对事业、对国家、对人民的一份忠诚。我去看了片子,她问我感觉怎么样,我向她伸出四个指头,“四个字。”她催问我是什么。我说:“秦怡品质”。

秦怡老师走了,走在这么一个时候,我们热爱她的人甚至都无法为她送行,我只能在心里静默着,怀念她,永远地怀念她。

打量
何红
摄

菜园

程远

我家有两块菜园,一块在房前,一块在房后。这没有什么稀奇。不过是因为我家把西头,西头有一条斜插过来的壕沟,壕沟外是付存家的田地和公社的打谷场,于是,壕沟就成了分界线。我之所以这样饶舌,是想说明我家的两块菜园,除了房前房后外,又向西边延展了几百平方米,这显然属于偏得,用现在的话说是结了地利之缘。

这在我们工人户中是不多见的。

比如我们这趟房的四家中,刘波、孙朋家居中,房前房后也有两块菜园,但只是与屋子宽窄相同的规规矩矩的两条,而把东头的杨柏栋家,虽然东边也有余地,但因为靠近下院的胡同,不能多占,只能戛然而止。

如果不是那条通往猪圈和厕所的小道把我家的两块菜园隔开,它们完全可以连成一片而成为一块大大的菜地。当然这样也很好,两块地,可以种不同的庄稼,而不仅仅是蔬菜。出身农民,后成为工人阶级的父亲就是这方面优秀的规划师和实践者。

前园朝阳,一般就种低矮的蔬菜,土豆、萝卜、白菜、韭菜、蒜苗、茄子、辣椒、生菜、香菜、西红柿、葱,甚至还有本地很少有人种的花生,可谓品种齐全,应有尽有。后园阴凉,则种一些高挑或是需要搭架的东东,如苞米、豆角、黄瓜、倭瓜。这些菜,一家人吃不了,母亲就送给亲戚邻居,有时也拿到市场上卖,换些零花钱贴补家用。有那么一两年,父亲在后园尝试种烟叶,这在我们工人户中实属异类,因为即便父母抽烟,二哥抽烟,也不至于自植,主要还是为了增加收入。现在想来,父亲也算具备一定的商业头脑,至于烟种得是否成功,作为小孩子的我不得而知。我只记得,一个深秋的夜晚,当我和母亲被窗外的雨声惊醒时,立即想起白天父亲的叮嘱:如果傍晚感觉天要下雨,一定想着用雨布把晾晒的烟叶盖上!可谁知,雨是半夜突然下起来的,尽管我和母亲冲出房门,来到后园,打开厚重的雨布将业已半湿的烟叶遮盖,次日还是遭到父亲的责骂。

那时父亲在矿上打更,上夜班。

除了上述两块园子种的一些时蔬、庄稼外,我家还在铁道南的柴禾垛旁、前山半山腰的菜窖边、老贾家房后的组扇(矿山井下排风系统)附近开了自留地,这些地主要种大豆、高粱和红薯,因为是山地,土壤贫瘠,离家远又不便浇水、施肥,长势并不喜人。如果再遭逢谁人捋掠,简直得不偿失。但父亲不这样认为,坚持种地,多种地,即便事倍功半,也是一种收获。攒下力气何用?难怪父亲是工人中的农民,飞机中的战斗机——当然,那时还不时兴这么说。那时我还没见过飞机。见过,也是在小人书上吧。

扯得有些远了,打住。

我家房前房后的两块菜园,我所在意的其实并不是它种植的品种如何多样,一日三餐多么丰富,尽管它足可成为全家人的食粮。我的欢喜,除了这些,还有母亲在两个园子的边边角角种了许多花卉,月季,芍药,鸡冠,秋菊,甚至罂粟,加上爬满栅栏的喇叭花简直绚烂至极。当然,罂粟是明令禁种

的,但仅有几棵并不惹人注意,何况这也是为了街坊邻居,谁犯牙病,能够含一点籽粒止痛。向日葵也是耸立在栅栏边的,但她似乎不算花,虽然也叫葵花。有了花,自然也就有了蜂蝶、蜻蜓和草虫,有了燕叫和鸟鸣,有了蛇出没。蛇是土蛇,不伤人,人也不伤它,碰见了就拾根棍子挑它到壕沟边的柳树毛子里。那柳树,也是父亲和哥哥们为了防水而栽的,如果是春天,远远望去如一条缥缈的绿色的绸带。

在后园的壕沟边,哥哥们还挖了一口水井,不深,只供旱季浇园子用。水井里也是放了几条从大河里抓来的鱼,只是不知何时,这口水井废弃了。同样废弃的还有前园的两棵树,套用鲁迅先生的名言:一棵是沙果树,另一棵也是沙果树。已经到了结果的旺盛期,忽然有一天,父亲说把它们砍了吧,省得欺园子。在父亲眼里,这些是副产品,但它们不同于那些鸡鸭鹅狗,前者不仅可以下蛋,招待客人,逢年过节还能派上更大的用场,后者可以看家护院。

我们无力反驳父亲,尽管沙果很脆很甜。

我能做的只是干完家务活,拿起书本到房后的屋檐下看书,写作业,画画。对,是画画。那时我正痴迷于绘画、书法艺术,每每闲来无事,就会拿个速写本蹲在园子里,一会儿画画黄瓜,一会儿画画苞米,谓之写生。当然,也画过电影票,在那五颜六色的纸上,用墨水笔,然后分发给刘波、孙朋(杨柏栋是不用给的,因为他爸是中学校长有招待票),只是成功率很低,经常被俱乐部把门的大叔识破,训斥一番。

电影没看成,就沿着铁道往家走。铁道上自然没有路灯,但道下的居民区却是灯光闪烁,那些近距离的人家窗口,甚至可以看到人影晃动,仿佛也是电影一般。

二哥说,他小时候的一次经历,绝不亚于电影——

一个雨天,他正趴在炕上的窗台边玩,几道闪电几声响雷之后,突然一个火球从敞开的后窗飞进来,在屋子里打转。几圈后,啪的一声,撞在他头顶不远处的窗框上,而他毫发未损。待大家惊魂落定,只见窗框被烧成了黑色,旁边的墙皮也脱落一大块。次日,听邻人说,当时正走在铁道上,眼见一个火球从沟口往沟里飞,一路跳跃奔突,直到粮站房头左转,向我们这趟房而来……你家二小子,命真硬!

这些都是夏天的事情。

冬天,我家的园子里也是一个欢场。刘波孙朋杨柏栋,还有我弟弟,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不仅可以在这里尽情地堆雪人、滚雪球、打雪仗,胯下一根苞米杆,手握木枪木刀,你追我赶,尽情操练。有时,干脆翻越西壕沟的柳树墙,到公社的打谷场去逮鸟,用弹弓或簸箕。前者好理解,后者还需米粒做诱饵,而一条细细的尼龙丝绳更是必不可少。逮到的鸟也多是麻雀,如果裹上黄泥放进灶坑里烧着吃,味道真是好极了!

当然,也有悲催的时候。那年腊月,清晨,父亲推开菜园门,发现一行陌生的脚印直奔西壕沟而去。紧挨后园门的仓房,锁头落地,压在瓷缸里的半扇猪肉不翼而飞。如果细究,也不难找到脚印去处。

算了,再有两天就要过年了。父亲说。